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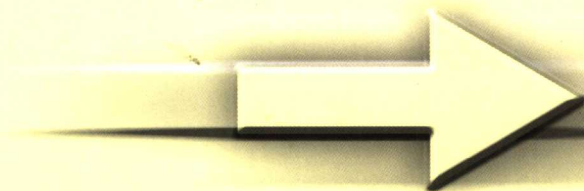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经济学学术文库

主编 耿明斋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次序

The Sequence of Market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刘东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河南大学经济学学术文库

中国市场经济化的次序

刘东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河南大学经济学学术文库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次序

著 者 / 刘东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65286768

项目经理 / 邓泳红

责任编辑 / 叶灼新 屠敏珠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9.125

字 数 / 216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564 - 4/F · 170

定 价 / 23.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河南大学经济学科教学研究基地自 1927 年诞生以来，至今已有近 80 年的历史了。一代一代的经济学人在此耕耘、收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著名经济学家关梦觉等都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曾留学日本的著名老一辈《资本论》研究专家周守正教授从香港辗转来到河南大学，成为新中国河南大学经济学科发展的奠基人。1978 年中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周先生率先在政治经济学专业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并于 1981 年首批获得该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1979 年，我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专门的《资本论》研究室。1985 年以后，又组建了我校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研究所，恢复和组建了财经系、经济系、贸易系和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经济学院。目前，学院已发展成为拥有经济学类全部 4 个本科专业、1 个博士生专业、8 个硕士生专业、两个省级重点学科点、2000 多名师生规模的教学研究机构。20 多年中，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并且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培训了大批专门人才。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服务于大学、企业、政府等机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学术繁荣做出了或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其中也不乏造诣颇深的经济学家。

在培养和输出大量人才的同时，河南大学经济学科自身也造

就了一支日益成熟的学术队伍。近年来，一批 50 岁左右的学者凭借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丰厚的知识积累已进入著述的高峰期；一批 40 岁左右的学者以其良好的现代经济学素养开始脱颖而出，显现出引领学术潮流的志向和实力；更有一大批 30 岁左右受过系统经济学教育的年轻人正蓄势待发，不少已崭露头角，初步展现了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的巨大潜力和光辉未来。

经过多年的探索，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目前已经在理论和应用经济学两个领域内分别凝炼出三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一是以《资本论》研究为切入点，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方法为工具，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二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欠发达地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探索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三是综合运用现代经济金融理论对中国的投资及金融体制、运作方式和资本市场进行研究的金融投资方向。

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组织出版相关学术著作始自世纪交替之际，2000 年前后，时任经济学院院长许兴亚教授（现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曾主持编辑出版了数十本学术专著，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对我院经济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展示我院经济学科各层次、各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是为了能够使这些成果与更多的读者见面，以便有机会得到读者尤其是同行专家的批评，促进河南大学经济学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决定出版“河南大学经济学学术文库”。根据初步拟定的计划，该丛书将分年度连续出版，每年选择若干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在编教师的精品著述资助出版。根据需要，也可在丛书中选入少量客座教授或短期研究

人员的相关著述。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教授，是他对经济学学术事业满腔热情的支持和高效率的工作，使本套丛书的出版计划得以尽快达成并付诸实施。也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负责人周丽、邓泳红及各位编辑同志为本丛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最后，还要感谢具体负责组织本丛书著作遴选和出版联络工作的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刘东勋博士，他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不辞劳苦的工作回报了同志们对他的信任。

分年度出版经济学学术文库系列丛书，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如何公平和科学地选择著述品种，从而保证著述的质量，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此外，由于选编机制的不完善和作者水平的限制，选入丛书的著述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恳请广大读者及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耿明斋

2004 年 10 月 5 日

谨识

内容提要

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成功地走过了 20 余年的改革历程。学术界曾经掀起的“激进”与“渐进”之争、“市场”与“股份”之争、“产权”与“竞争”之争，在改革的实践摸索中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用激励机制改革代替简单的私有化、竞争出效率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在理论上得到了升华。本书从放松规制角度，进一步阐释了渐进式改革的逻辑和次序。

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放松规制不同，转轨经济中的放松规制不仅包括自然垄断性产业，还包括竞争性产业，而且实际上是一个体制变迁的过程。在制度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遵循着非线性的演化规律，经济系统的效能依赖于各种制度规则。制度规则演化的动力来源于开放和竞争打破了制度供求的平衡，制度失衡形成了新的赢利机会，促使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不断创新和模仿，形成系统的自组织过程。

在放松规制的制度演化中，厂商策略和产业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倡导的提高劳动积极性，短缺经济留下的巨大供给缺口，引发了巨大的赢利机会，在国家财政投资能力限制及其导致的地方分权的促动下，诱发了乡镇企业、军工企业、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大举进入。但地方分权体制的过度发展造成了两个困难：投资与进入过度 and 退出的行政性体制壁

垒。因此，供求平衡后地方分权体制成为改革的对象之一。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在消费市场均一化的情况下，即使信息不对称，伯川德竞争和多厂商古诺竞争说明，竞争性产业的价格规制是无效的。在消费市场细分化以后，产品差异化要求的巨额研发投入，以及金融市场不完善造成的大企业融资成本较低，决定了产业重组和市场集中的必然结果。

自然垄断产业的技术特点常常成为规制的理由。但现实中经常存在规制失效：首先，规制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规制失效；其次，规制者经常被产业利益集团所俘虏；再次，规制的范围实际上并没有传统上所认为的那么宽泛；再其次，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固定成本；又其次，可竞争市场理论表明，从长期来看所有的成本都是可变的，因而长期进行自然垄断的独占规制是不合理的；最后，可以用接入和互联标准与质量检查相结合的外部契约规制，代替传统的自然垄断独占性规制。在竞争性产业趋于供求平衡以后，自然垄断产业的瓶颈约束越来越强，从而产生了自然垄断产业发展的巨大空间和赢利机会，于是，类似的放松规制过程再次在自然垄断产业重演。

综上所述，在本文的框架里，渐进式改革道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先营造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伴以激励机制体制的相应改革，不过是放松进入规制而已，是放松规制的系统改革的第一步；在供求平衡以后，价格规制事实上不再起任何作用，放松价格规制应运而生；随着产品市场的逐步发育和成熟，产品升级和技术竞争将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产业重组和市场集中就会要求要素市场价格改革。

前言

一 引 言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产生了个人和社会的冲突和协调问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这种冲突和协调表现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和协调。集体理性的形成是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通过适应性进化的过程，人们逐渐“学会”的思维定式和行为规范，或者说是人们达成的一种“共识”或价值观、道德理念、伦理规范，这是一切“习惯法”或“不成文法”形成和贯彻执行的基础。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更多地表现为对这种行为规范或“社会共识”变迁的研究。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导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系统：一种是以西欧、特别是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制度模式”为代表，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性的观念；另一种以东亚国家为代表，集体主义压倒了自由主义。在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人们发现，具有内在制度性激励（或激励相容）的制度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的、自私动机驱使下的、善于发现、协调和利用各种复杂多样的信息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欧北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其社会历史中自发地演化发展过来的，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较强的效率优势。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制都在模仿和学习这种在历史演化

中表现相对优越的制度，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次生”的，是从其他国家引进的，如何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系统相协调成为成功与否（学习成本高低）的重要标志。其中成功的学习者以日本为代表，之后是步日本后尘的东亚诸国。

“东亚奇迹”的出现和崛起引起了人们对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模式或“盎格鲁—撒克逊式”制度模式——“东亚模式”的认识。东亚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明智政府引导下的、开放的或市场化导向、出口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最先是被查默斯·杰弗逊所命名和倡导的，^①之后被世界银行注意，并于1993年出版《东亚奇迹》一书给予总结和宣扬。^②此后，掀起了一股关于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大讨论。其中，克鲁格曼在1994年《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Asian Miracle）一文，通过引用阿尔文·杨（Alwyn Young）研究报告中的数据，认为亚洲奇迹并不存在，其高速增长只是大规模投入引起的粗放增长而已，一旦资源耗尽且资本产出比率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增长很快就会因投入的规模收益递减而急剧下滑的观点被之后的实证研究所证伪——《经济学家》上的一篇论文“亚洲奇迹结束了？”的文章总结了如下的集中反对意见：瑞士联合银行（UBS）使用1970～1990年的数据进行的与阿尔文·杨同样的分析表明，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韩国

① Jhonson, Chalmers (1982) 被称为日本模式之父，他认为日本政府实际上培育了产业的发展，并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在西方国家中政府只是制定规则。转引自迈克尔·波特：《日本还有竞争力吗？》，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第33～34页。

② 《东亚奇迹》一书中区别了新古典经济学、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学者的看法。

和中国台湾的平均 TFP（总和要素生产率或索罗残差）增长率处于被统计的 104 个国家的前 12 位，其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源投入量的增加对 GDP 的贡献率不分轩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迈克尔·萨雷尔（Michael Sarel）对东盟国家的研究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 1978 ~ 1996 年间的年均 TFP 增长率为 2% ~ 2.5%，远远高于美国同期的 0.3%，而且，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东盟多数成员国的 TFP 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①

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使东亚模式再次受到了挑战。虽然斯蒂格利茨辩解说，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共同规律，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东亚模式。^②但他的文章因为不能提出更为有力的解释而显得苍白乏力。相反，反对派的观点则坚实有力：迈克尔·波特（2002，中文版）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日本之所以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多不正确干预，扰乱了市场作用的发挥，而像刺激需求这样的政府正确干预经济的方法却未被认识到。波特错误地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简单地对立了起来。其实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不同的，其关键在于政府和市场两种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张五常认为，有悖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佃农耕作制度之所以在亚洲十分盛行，其重要原因是由于这种制度在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中的好处。

为了更好地解释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化中的成本动态变化问题，需要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新理论。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为重要的试验场，中国经济学界开

① 科特勒、卡塔查亚：《重塑亚洲——从泡沫经济到可持续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第 22 ~ 27 页。

② 斯蒂格利茨：《国家作用的重新定义》，载青木昌彦等编：《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第 24 ~ 54 页。

始与世界关心这类重大变革的经济学人一起，通过比较经济体制学、过渡经济学、体制变迁经济学、进化博弈论或博弈学习理论、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不同的研究路线来构建这一新兴经济学科。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体制变迁过程。把它看做一个复杂的演化大系统，研究这种体制变迁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是本书感兴趣的新研究方向。

首先，复杂系统从相对稳定到产生混沌状态的临界条件是什么？奇异子吸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混沌后的分岔路径有几条并逐步收敛于何处？其内在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我们能否认识到其中的规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控制？控制什么？如何控制？

其次，从混沌到稳定的过程中，人们的信念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如何选中并形成一种新的价值系统？人们的认识规律与年龄存在什么规律？青年人和老年人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会对这种社会价值系统的演化产生何种影响？

最后，系统初始状态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对系统演化的结果会产生何种影响？系统混沌时外生因素的作用明显增强，面对这些影响人们是如何选择的（如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在众多思潮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本书拟从产业组织角度给予一种改革进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次序的解释。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呈现如下规律性次序安排：为了改革原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信息利用效率和激励相容性方面的弊端，增强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等激励增强机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首要选择，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浮动工资和国有企业中承包制的实施，目的均在于此；上述措施的实施结果是，大大提高了人民收入水平，从而释放出长期被计划经济时期短缺经济状态下被抑制的巨大市场需求；在中央财政投

人水平非常有限的硬约束下，地方分权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多种利益主体纷纷在利益诱惑下努力为本地区争取产业进入权；其结果是短期内供给能力的迅猛增加；供求平衡成为价格管制失效和放松价格管制的基础；但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则进一步诱发出产业整合和产业集中的客观要求，于是，放松要素市场的管制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可以说，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完成，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成功。

二 社会主义大论战对改革起点的启示

20 世纪 30 年代由米瑟斯掀起的社会主义大论战，经过两轮大的理论讨论，最后经由前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和世界性的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所证明，哈耶克所批评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缺乏信息利用优势和存在激励相容困境切中要害。激励机制设计理论证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信息利用效率上要低于市场经济体制。在产权理论的启发下，委托代理理论证明，公有制存在体制的激励相容性问题。公共选择学派证明，政府是不可信赖的。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在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时期具有较高的比较效率，但在随着要素价格的变化，自动实现增长方式转型方面，特别是在创新的激励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性效率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经过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在摸索中发现，在如何调动生产劳动者的积极性（激励相容）方面、在促进商品流通（信息利用）方面，引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于是产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过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中也要有市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等多次讨论，在改革实践的促进下，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在中国的地位。

但在改革的过程中，改革从何处着手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有代表性的大讨论有过两次，一次是以市场环境优先还是企业改革（股份化）优先的争论，一次是竞争重要还是产权重要的争论。最后，在改革实践的实验中，逐步确立了市场化和竞争先行的改革方略，国有企业改革的安排相对靠后。据说，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在中国尚未形成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在传统的福利制度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实际上担负着社会保险的功能，虽然加大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但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可以节约社会成本和改革成本；二是国有企业在担负社会保险功能中，履行着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其负担之严重，需要等到在增量改革促进下使体制外经济成分充分成长起来，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下降到足够低的程度，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一个吸纳就业的市场环境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时机才算到来；三是意识形态的演化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在改革中用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

在本书看来，市场环境的塑造还是企业改革（股份化）、竞争环境的塑造还是产权改革（民营化），不过是放松进入规制的问题。他们都不是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激励机制的增强和市场需求的释放才是主要原因。因为需求和赢利动机的形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推拉力量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

三 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策略 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策略具有普遍的国际借鉴意义。但以萨克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成

功只是由于初始条件的特殊性（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东亚的成员）。

我们承认改革初始条件对改革成败的重要影响，但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践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重大的挑战。因为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前苏联“大爆炸式”改革的困境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斯蒂格利茨把这个问题归因于信息问题，可以说是抓住了一个重要原因。但似乎远远不仅如此。

体制变迁经济学强调非正式规则演化对改革成败的影响，进化博弈理论强调社会共同信念的演化发展，演化经济学强调复杂大系统演化中混沌—分形的非线性演化规律。由此看来，人们的行为规范系统的演化规律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将改写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中国改革的实践将在这一方面提供重要的研究素材。

四 放松管制次序角度的考察

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成功地走过了 20 余年的改革历程。学术界曾经掀起的“激进”与“渐进”之争、“市场”与“股份”之争、“产权”与“竞争”之争，在改革的实践摸索中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用激励机制改革代替简单的私有化、竞争出效率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在理论上得到了升华。本书沿着上述思路，从微观的放松规制角度，进一步阐释了渐进式改革的逻辑和次序。

改革和转轨的产业组织角度考察的文献主要有江小涓（1999）、马建堂（2000）、大冢启二郎等（2000）。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在动力考察主要是杰弗逊和劳斯基（2000）。经济市场化的次序最初由麦金农（1997）给出（宏观和金融角度的考察）。

先增强激励、培育市场是改革最好的突破口。在赢利动机的

驱使下，利益主体主动寻求产业进入时，应该放松进入规制。供求平衡以后，价格规制将会失效。价格竞争加剧以后，产业重组的要求产生。加上收入分层化和消费市场细分化的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竞争将成为主要竞争手段。放松要素市场规制的要求越来越强。要素市场化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改革的成功。

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放松规制不同，转轨经济中的放松规制不仅包括自然垄断性产业，还包括竞争性产业，而且实际上是一个体制变迁的过程。在制度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遵循着混沌的、非线性的、不可逆的、存在不断自我增强机制（正反馈）的演化规律，经济系统的效能依赖于各种制度规则。制度规则演化的动力来源于开放和竞争打破了制度供求的平衡，制度失衡形成了新的赢利机会，促使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不断创新和模仿，形成系统的自组织过程。

在放松规制的制度演化中，厂商策略和产业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书依据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沿着诺斯—德姆塞茨的分析思路，认为“改革开放造成的赢利机会的出现，可以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企业和政府自觉地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利益诱导（制度变迁的需求）机制是改革的动力机制之一。赢利机会的出现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确立的、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相关的激励措施的实施，例如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浮动工资制度等。居民收入的提高刺激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加上短缺经济留下的空档，形成了巨大的供给缺口。由于财政投资能力的限制，中央政府不得不放松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和投资自主权（地方分权），进而诱发了（由社队企业转变而来的以及新建的）乡镇企业、民用化的军工企业、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大举

进入。这种分权体制是在民间缺乏投资主体的情况下较好的过渡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在营造竞争性市场环境方面功不可没。

不过，由于地方主义（个体理性）与国家利益（集体理性）的差异，这种分权体制的过度发展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投资和进入过度造成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等问题，二是退出的行政性体制壁垒。因此，当供求平衡以后（由于投资的产出滞后性，实际上应该提前半年以上），地方分权体制已经与市场要求不相适应，成为改革的对象之一。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首先，在消费市场均一化的情况下，即使信息不对称，但伯川德价格竞争和多厂商古诺数量竞争说明，竞争性产业的价格规制是无效的。其次，在消费市场分化以后，产品差异化要求的研究开发的巨额投入，以及金融市场不完善造成的大企业融资成本相对低廉，决定了产业重组和市场集中的必然结果。再次，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竞争性产业趋于供求平衡、而且与自然垄断产业对稀缺生产要素资源的竞争缓和以后，自然垄断产业的瓶颈约束越来越强，从而产生了自然垄断产业发展的巨大空间和赢利机会，于是，类似的放松规制过程再次在自然垄断产业重演。

不过，由于自然垄断产业具有特殊的技术特点，人们的认识有待刷新。实际上，现实中经常存在规制失效：首先，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规制者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使规制失效；其次，规制者经常被产业利益集团所俘虏，从而与大众利益脱节；再次，规制的范围实际上并没有传统上所认为的那么宽泛，从而是可以缩小以改进产业绩效的；再其次，技术进步已经改变了许多产业的自然垄断技术特性，大大降低了固定成本，因而可以放松规制；又其次，可竞争市场理论表明，从长期来看，所有的成本都是可变的，因而长期进行自然垄断的独占规制是不合理